

【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逻辑与优化

刘玉 周欣平 邹碧莹

摘要:区域不平衡治理是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区域的平衡和充分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优化空间治理与协调区域关系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上述目标并结合不同时期宏观发展环境与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构建起了中国特色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逻辑,具体表现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推进生产力平衡布局,提升发展能力;通过基本条件与机会均等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从根本上缩小差距;将重点发展与统筹布局相结合,持续深化空间治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共同发展,构筑和谐区域关系。新发展格局下,加强区域分工,促进合理集聚;畅通经济循环,深化区域合作;创新帮扶机制并构建利益链,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等应成为未来治理优化的方向。

关键词: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协调发展;区域治理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3)06—0069—07 收稿日期:2023—09—12

作者简介:刘玉,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周欣平,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872)。

邹碧莹,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北京 100872)。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①。区域不平衡是发展不平衡在空间上的表现,也是发展不充分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张可云,2020)。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也是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意义重大。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相关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已比较丰富,许多国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本国经济在空间上能够向更加均衡的状态发展(孙志燕等,2019)。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道路曲折,经济社会不断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具有更复

杂的成因与表现,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既要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要与中国区域发展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华小鹏,2020)。已有研究从发展结果、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三个维度阐释区域平衡发展的内涵,揭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与内在动力机制(孙志燕等,2019);从地区间财政权分化(杨爱平,2007)、发展权失衡(杨爱平,2011)、高层次人才流动(Zhou, et al., 2018)和贸易差异(李国柱等,2007)等角度探讨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成因,为深入认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奠定了基础,但对差距以外的问题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的动态变化探究不多,规律性总结与展望性研究仍需加强。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不同时期的国情与主要社会矛盾,中国不断探索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逻辑,对创造“中国奇迹”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下,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的任务发生转变,治理对策需进一步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紧密围绕缩小区域差距、优化空间布局和协调区际关系三个方面,归纳总结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逻辑与实践创新,并基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思考未来优化方向,旨在为总结中国规律、进一步促进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重点与演化

区域平衡发展强调的是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过大的差距、不合理的空间开发格局以及不协调的区域关系都是不平衡的表现,三者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成为治理的重点。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空间范围内,绝对的平衡很难实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和治理重点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1. 缩小区域差距:从绝对差距到相对差距

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差异大致决定了一个区域的初始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间分工。经济增长中,具有主导性和创新性的企业向相对优势区位集中,逐渐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在增长极的作用过程中,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崔功豪等,2006)。这种背景下区域差距不断形成并扩大,为空间不平衡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处于发展边缘的地区主要经济指标位居某一绝对水平以下,属于绝对落后状态。在战略政策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下,欠发达地区越过绝对落后门槛,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则转变为相对差距。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习近平,2021)。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奠定了沿海与内陆、平原地区与高山高寒区等区域发展差距的初始格局,社会分工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叠加其他因素则不断加深区域发展差距。现阶段中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欠发达地区发展环境明显改善,但区域之间的相对差距仍然显著并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区域间出现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等发展动力的分化,相较于资本,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其影响下,区域不平衡可能会向纵深方向发展。应注意防止由区域间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分化引致的新的区域差距。

2. 优化空间治理:从有序开发到结构优化

随着区域发展的不断分化,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越来越不均衡,空间开发无序问题逐渐显现,并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产业和劳动力进一步向优势地区集中,城镇和城镇密集区作为区域或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人口、经济规模与密度不断上升,建设用地急剧扩张,城镇空间扩张失去边界约束;内部用地结构失衡,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等不断被挤压,资源环境负荷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边缘地区为了摆脱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局面,通常会加大资源投入与开发强度,引发无序、不当的空间开发。空间无序开发不仅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生态环境破坏,由此产生的割裂发展还会阻碍要素的空间流动与合理配置,进而影响区域的平衡、充分发展。

中国区域间吸引要素与经济活动的强度差异显著,容易引起空间无序开发(杨伟民,2013)。经济规律作用下,人口和经济活动持续向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集中,围绕这些地方形成多个经济集聚区。集聚趋势下,经济集聚区与非集聚区之间、经济集聚区之间、经济集聚区内部核心与外围地区之间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值得关注,如何促进具有不同竞争优势的区域在空间上形成联动开发格局,关系到能否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首先需要遏制无序开发势头,建立起合理的空间开发秩序,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优化空间开发结构,畅通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与经济循环,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3. 协调区域关系:从解决冲突到深层协作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的创新能力以及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具有很大差异,因此在产业链、价值链和利益链中的地位显著不同,优势区域发展机会更多、获益更大,通常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且长期来看,空间开发无序带来的不良后果会引发更激烈的区域资源争夺与利益冲突。在此背景下,区域之间分工格局与优势逐渐固化,难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作关系和公平对等的区域利益分配关系,以及实现深层次的利益格局均衡(易森,2021),由此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市场与制度共同作用逐渐强化了中国经济发达、行政等级高的地区在分工体系中的优势,使其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更为突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回流、跨区资源调配输受双方收益不均,以及生态功能受益方对提供方补偿缺失等问题影响了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需要理顺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区域间形成深层次的协作。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逻辑与成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调整、优化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改革开放前,在平衡布局理论的影响下,结合当时工业生产过度集中在沿海、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情,中国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中国实施了先富带动后富,即区域非平衡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区域发展差距却有所扩大,在此背景下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等,积极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完善空间不平衡治理。在此过程中,围绕缩小区域差距、优化空间布局和协调区际关系等重点目标与任务,探索形成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的中国逻辑,取得了显著成效。

1.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推进生产力平衡布局,提升发展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平衡分布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内地开启工业化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但由于企业、项目等缺少配套协作,综合发展能力不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亦受到一定阻滞,经济整体发展进程缓慢。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平衡布局思想的提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陈健等,2020),而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诞生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积累,不具备生产力大发展的前提。中国在实践中总结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

项长期工作,只有在开放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增强国家整体发展实力,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区域间协同、高效、平衡发展;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举措包括缩小差距,但又不能仅局限于缩小差距,更不能满足于低水平、低效率的“平衡”,应当让各地区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发展促平衡,实现共同富裕。

“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②。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了区域非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建立一批制度与产业示范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下探索创新模式,不仅使区位优势、基础较好、潜力较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也引领了其他地区共同发展,为后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和保障民生底线,生产力平衡布局程度不断提高。1978—2021年,中国省际人均GDP极值倍数和泰尔指数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见表1),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持续缩小态势。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生产力平衡布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表1 1978—2021年省际人均GDP差距及泰尔指数

年份	极值倍数 (含直辖市)	极值倍数 (不含直辖市)	泰尔指数
1978	上海/贵州 14.2	辽宁/贵州 3.89	-
1990	上海/贵州 7.30	辽宁/贵州 3.33	0.0776
2000	上海/贵州 10.87	浙江/贵州 4.88	0.1088
2010	上海/贵州 6.16	江苏/贵州 4.10	0.0832
2020	北京/甘肃 4.58	江苏/甘肃 3.38	0.0621
2021	北京/甘肃 4.57	江苏/甘肃 3.37	0.0622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注:(1)人均GDP计算中,2000年以前人口为户籍人口,以后为常住人口。(2)极值倍数为每年人均GDP最高值与人均GDP最低值的倍数。(3)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参见:贺灿飞、梁进社:《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与城市化》,《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

2.通过基本条件与机会均等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从根本上缩小差距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之一,也是中国解决区域

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终极目标(马纯红,2016)。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平衡布局思想指导下主要通过投资与布局倾斜促进地区间的平等发展,改革开放后则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不平衡治理不断加强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并从实现“地区繁荣”向实现“人的幸福”转变(赵祥,2016),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基础上缩小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国家通过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保障与改善民生、稳就业、促收入等措施对困难地区,尤其是着重向困难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多种帮扶,促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分工体系。让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够享受相对均等化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实现区域间住房、教育、医疗和生态等方面服务水平的大致趋同,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也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阶段,中国省际交通、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主要指标的人(地)均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一些指标例如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均图书馆藏书量和人均卫生技术人员拥有量等,除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等东部发达省(市)外,陕西、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见图1),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数量均等化的目标初步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目的(何昌明等,1987)。为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

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保障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人才与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给人们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部门配置效率和空间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3.将重点发展与统筹布局相结合,持续深化空间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也产生了耕地减少过快、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空间结构不合理、城乡和区域间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差距大等突出问题。为了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和优化空间布局,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根据主体功能增强对区域的统一部署与宏观调控,对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富集地区等制定差异化政策,分类精准施策^③,有效提升空间开发的有序性和合理性。同时,通过合理部署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并与转移支付等手段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都取得显著进展。同时,通过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并结合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逐渐建立起了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协调发展、内外统筹的新格局(见图2)。将重点发展与统筹布局相结合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既促进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展较好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也使中西部地区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与合作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扩大出口贸易,全方位带动了沿海、内陆,西北、东北、沿江和沿边等各区域的协同发展(梁倩等,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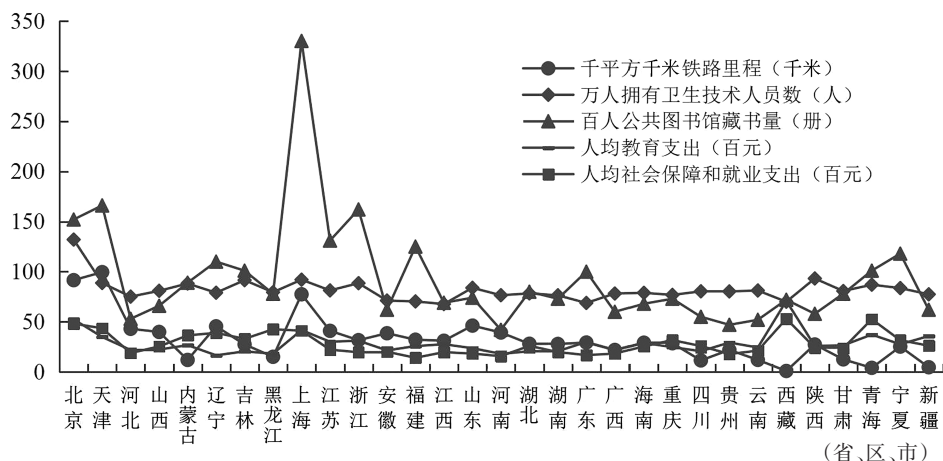


图1 2021年中国省际主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人均指标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

注:数据不包括港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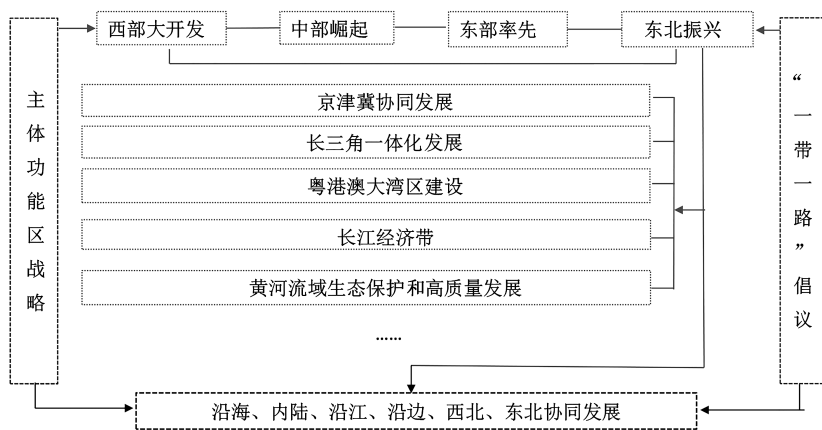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纵横联动、内外统筹的区域经济布局与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4.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共同发展, 构筑和谐区域关系

坚持全国一盘棋,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中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④。中国在不同时期集中有限资源, 通过投资倾斜、资源配置、生产布局和转移支付等对困难地区给予有力的支持与援助, 有效遏制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同时, 区域整体利益和大局意识也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抑制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 中国投资与项目大幅向内地倾斜, 甚至直接将少数易于搬迁的企业搬到内地, 在内地培育工业化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沿海地区牺牲了一定的发展机会。改革开放后, 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更是依靠内地和沿海的两个大局意识才得以顺利实施。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同样是在全国一盘棋格局下的持续深入推进。1994—2021年, 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累计96.76万亿元, 受益程度沿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方向递增, 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区域问题较严重地区得到的转移支付明显超过其他地区, 显著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 同时为其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援助支持在促进区域平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⑤。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上海、北京、天津等东部直辖市就开始实施对新疆、西藏等西部省份的援助。现阶段, 对口支援不断向纵深发展, 通过协助建设基础设施、提供教育

医疗服务和干部交流、组织劳务输出与人员培训、开展技术转化与合作、加强产业转移与共建产业园等举措, 形成了多元化的地区间帮扶与合作形式, 建立起长效帮扶与合作机制, 对缩小区域差距、加强区域联系、促进平衡发展意义重大。此外, 中国还发挥组织能力优势, 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参与到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工作中, 企事业单位、支边干部与驻村干部及各种社会力量在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建设及援助帮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 欠发达地区的部分居民服从国家的动员与安排, 落实异地搬迁, 为扶贫开发、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及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的顺利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的优化与展望

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陈健等, 2020), 在中国特色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逻辑的作用下, 国家重点解决了区域发展的绝对差距问题, 并不断优化空间结构与区域利益关系, 促进区域平衡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区域发展不平衡表现出一些新趋势。比如, 区域经济发展动能分化, 区域差距不仅表现为发展总量差距, 更表现为质量与效率差距。未来, 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需要围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和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 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⑥, 深化区域不平衡治理成效。

1. 优化分工体系, 在集聚中促进平衡

分工是手段, 合作才是目的, 分工越精细, 越要加强合作(曾国屏, 2011)。都市圈和城市群是人口和经济活动持续集聚的优势区域, 也是分工合作最紧密的区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⑦, 为此需要积极培育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和城市群, 增强城市化地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在集聚中实现区域

均衡。具体地,应明确都市圈内大城市与周边城镇、乡村地区之间的功能定位与分工关系,破除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在数字技术和低碳技术的推动下,加快5G基站、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心—外围地区的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与均衡水平,促进要素充分流动、产业分工协作、城市功能互补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城化。通过强化分工优化的内在动力有效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解决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问题。都市圈发展到较高水平后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群范围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和都市圈之间展开更高层次的分工合作与利益共享,最终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协调、平衡发展。

2. 畅通经济循环,在深化合作中实现区域共赢

新发展格局下,应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加快建设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全国大市场,以数字化、低碳化转型为契机,打通经济循环通道,消除区域间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阻滞和壁垒,加强各类型区域之间的合作。在经济集聚区之间形成合作竞争、循环有序的发展环境,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快速提升欠发达地区与衰退地区的软硬环境水平,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技术改造和管理创新方面的短板,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回流,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引领优势和各地区资源禀赋特点,培育建立充满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优化国内需求结构,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通过深化区域间合作,实现投资与消费平衡增长、投入与产出效率提高以及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3. 创新帮扶机制,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较大,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和解决温饱问题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区的创新发展能力与发达地区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新时期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合理运用市场机制,提升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应当创新区域合作与帮扶机制,在已有资金援助、项目合作、人员交流、产业转移等基础上,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在区域间的合理布局及基于利益链分解的专业化分

工,促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高层次的水平协作,逐渐形成稳定、合理、高效的产业分工与组织体系,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从脱贫到致富,从生存到发展,从高增长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同时,应当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避免区域间非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扩大,推进新时期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向纵深发展。

五、结语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治理逻辑与宝贵的治理经验。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推进生产力平衡布局,提升发展能力;创造均等化的基本条件与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从根本上缩小区域差距;将重点发展与统筹布局相结合,持续深化空间治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共同发展,构筑和谐区域关系等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逻辑。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如期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着重解决的是消除绝对贫困,大力发展生产力并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格局,以及构筑平等、协调的区域利益关系。在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需要进一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深化区域协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应当在健全既有治理逻辑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不断创新、优化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体系,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和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强化区域分工优化的内在动力,在促进合理集聚、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的过程中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畅通经济循环,在深化合作中实现区域共赢;创新帮扶机制与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内生动力,实现区域发展从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转变。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4—35。②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26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③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8页。④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⑤摘自2016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⑥摘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参考文献

- [1] 华小鹏. 辩证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区域治理现代化的关系[N]. 光明日报, 2020-10-09.
- [2] 张可云.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十四五”时期区域治理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2).
- [3] 孙志燕, 侯永志. 对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多视角观察和政策应对[J]. 管理世界, 2019(8).
- [4] 杨爱平. 地方财政权的区域分化: 区域不平衡发展的一个解释视角[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 [5] 杨爱平. 从地方发展权的失衡看当代中国的区域不平衡发展[J]. 太平洋学报, 2011(10).
- [6] Zhou Y, Guo Y Z, Liu Y S. High-level Talent Flow and Its Influence on Region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China [J]. Applied Geography, 2018 (19): 89-98.
- [7] 李国柱, 马树才. 区域贸易差异与区域不平衡发展研究[J]. 商业研究, 2007(8).
- [8] 崔功豪, 魏清泉, 刘科伟.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9] 习近平. 推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 求是, 2019(24).
- [10] 杨伟民. 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J]. 宏观经济管理, 2013(5).
- [11] 易森. 新时代区域经济布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城市分工理论的视角[J]. 经济纵横, 2021(4).
- [12] 薄文广. 实现共同富裕亟需加快完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N]. 光明网, 2021-04-13.
- [13] 陈健, 郭冠清. 马克思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思想: 从经典理论到中国发展[J]. 经济纵横, 2020(6).
- [14] 马纯红.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渊源及实践探索[N]. 光明日报, 2016-09-14.
- [15] 赵祥. 从实现“地的繁荣”向实现“人的幸福”转变[N]. 南方日报, 2016-06-27.
- [16] 何昌明, 张守华.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J]. 社会主义研究, 1987(1).
- [17] 梁倩, 班娟娟, 陈淑兰. 重大区域战略打造协调发展新格局[N]. 人民网, 2019-09-04.
- [18] 曾国屏. 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D].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Governance Logic and Optimization Direction of Region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China

Liu Yu Zhou Xinping Zou Biying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region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reg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s related to the balanced and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Narrowing the gap, managing spatial disorder and coordinating regional relationship are the key points of governance of region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ombining the macro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ocial principal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China has constructed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cludes: vigorously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to promote a balanced layou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enhanc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equalizing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peopl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fundamentally narrow the gap; combining key development with overall layout to deepen spatial governance; making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o promote regional common development and build harmonious regional relation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trengthening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promoting rational agglomeration; unblocking the economic cycle, deep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nnovating the support mechanism and building the interest chain, and promo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of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Key Words: Region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gion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文 锐)